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近代的超克”與戰爭的二重性：竹內好與“永久戰爭”的理念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and the Duality of War:
TAKEUCHI Yoshimi and the Idea about "Permanent War"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04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林鍵麟(Jian-Lin Lin)

頁數/Page：32-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洲作為抵抗線的問題意識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32-44

「近代的超克」與戰爭的二重性： 竹內好與「永久戰爭」的理念*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and the
Duality of War: TAKEUCHI Yoshimi and the Idea about
“Permanent War”**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林鍵麟 翻譯

Jian-Lin Lin

輔仁大學日文系碩士

戰爭即是民族再生的祈願，戰爭即是「近代的超克」。

—— 龜井勝一郎

太平洋戰爭被傳統賦予了注定成為「永久戰爭」的宿命。

——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

一、「近代的超克」論及其再論

竹內好寫下作為「近代的超克」之戰後再論的同名論文是在1959年，收錄於筑摩書房出版的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七卷《近代化與傳統》當中，他當時擔任此卷之編輯。關於此篇論文，竹內好曾親自

* 本篇由子安宣邦教授及日文版發行單位青土社同意授權，出自子安宣邦新著：《「近代的超克」とは何か》（何謂「近代的超克」），東京：青土社，2008。本篇為第10章〈「近代的超克」と戦争の二重性：竹内好と「永久戦争」の理念〉，頁187-208。

如此解說過：「本稿乃由〈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所延伸發展而成。對於『近代的超克』論者有如萬惡根源這樣的戰後評價，實在無法認同，所以一直都希望能有機會親自去作深入調查」。關於竹內好在此所提其自身論作〈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我已在之前〈「近代的超克」論序章：昭和意識形態批判〉（〈近代的超克〉連載第一回）一文中介紹過。或許也可說，正是有竹內對此論說的相關介紹，才會有我〈近代的超克〉的連載。以此論說，竹內成爲戰後第一位將日本浪漫派再評價視爲問題者。從「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近代主義者們避開了鮮血淋漓的民族主義前行」這句話，就能看出竹內對於日本浪漫派的再評價，即是重新去面對、深思長久以來戰後思想所迴避、無視的「民族主義」。只是他所謂的「民族主義」，與在前文中所介紹過的一樣，和「近代主義」爲相反的概念，既不是日本主義也不是國家主義的同義詞。「近代主義」一詞被賦予了日本人對歐洲近代文明的強烈依存、從屬的態勢之意，同時，「民族主義」也就意味著與其相對抗亞洲的獨立立場。竹內所說的「民族主義」並不是日本主義—國家主義式的國族主義，但從具有讓日本擁有自立的基礎此一志向來看，仍然可以屬於國族主義之範疇。竹內寫下這番論述的1951年，正是同盟國在中國及韓國都缺席的情況下，於舊金山訂定《對日和平條約》（又稱《舊金山和約》）的年份。此和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日美安保條約》）乃一體兩面的存在。日本以被劃入美國冷戰時期軍事戰略的型態而恢復獨立。這真的能算是獨立嗎？竹內一面探究此一疑問，一面寫下了〈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重新評價日本浪漫派。

1959年被稱爲日美新時代的到來，由岸內閣著手進行《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此一修訂，意味著這次日本乃自主性地進入美國核子傘的保護之下。在這樣的1959年，竹內認爲，「『近代的超克』在事件上已成爲過去。但在思想上則還未過去」，爲了對「近代的超克」進行戰後再檢討，竹內寫下了名爲〈近代的超克〉的論文。這裡被再檢討的「近代的超克」論，來自於雜誌《文學界》於1942年9月號與10月號所連載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上之議論。就如同整理此座談

會結果的河上徹太郎所謂「開戰一年間知性戰慄時之作」，「大東亞戰爭」開戰的衝擊讓文學者、知識分子舉辦了這場座談會，並將其議論集結濃縮於「近代的超克」此一主題中。彷彿就像對英美開戰般，將潛藏於昭和日本知識分子意識之中，長久積累的一切問題都歸結於「近代的超克」論中。這也代表著「大東亞戰爭」成爲了背負「近代的超克」此一近代日本宿命課題的戰爭。如此一來，「支那事變」以來，帶有最終決戰預感交織而成的眾多議論——政治學者們以「東亞協同體」爲中心的議論、哲學家們從「世界史的立場」出發的議論，以及浪漫主義者所稱「詩」的叛亂之議論等——都隨著開戰而對於「近代的超克」這樣的日本近代宿命課題一再確認，又或者該說是重新背負起此一課題。「近代的超克」可說是隨著「大東亞戰爭」的開戰而成立，並與此戰爭同爲日本知識分子所背負的理念及課題。

1959年，竹內以「近代的超克」的思想仍未成爲過去，從而寫下了對其再檢討的論文。這或許也意味著被稱爲背負「近代的超克」理念的「太平洋戰爭」，在思想上仍未成爲過去、尙未得到釐清。確實《舊金山和約》已爲戰爭劃下句點、日本也重回冷戰下的國際社會、經濟得到復甦。但《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問題也重啓了戰爭之善後議題。得到善後的只有名爲太平洋戰爭的對美英戰爭不是嗎？現在的戰後日本不正是位於此戰爭處理的延長線上嗎？如此看來，竹內「近代的超克」論的再論，也就不得不帶有「大東亞戰爭」論之特性了。

二、戰爭的二重性：一

細讀竹內「近代的超克」再論，大概都會發現另一個主題就是「大東亞戰爭」吧。我原先認爲此「大東亞戰爭」論，乃是自「近代的超克」再論中所衍生出來的次要問題。從其議論展開的脈絡來看確實是如此。但在創作本稿時再次重讀竹內的再論後，反而開始覺得會不會「大東亞戰爭」論才是竹內本身的「近代的超克」論呢？我在本文一開始所寫的，也是爲了對此事一再確認。竹內在「近代的超克」再論中，引用了龜井勝一郎於戰後10年時對日本近代史所作的反省性

發言。順道一提的是，身為該座談會重要發言人、亦為日本浪漫派一員的龜井，此一戰後發言，在竹內的再論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戰爭，對當時的我而言，意味著必須要對「近代化」日本的精神病態之抵抗與治療。就像我已提及的一樣，必須是克服各種危機的意志、非有對民族起死回生的祈望不可。戰爭即是民族再生的祈願，戰爭即是「近代的超克」。在我眼中看來，無數的戰死者便是在那極端的行動中，實現「純粹性」的聖者。

竹內引用龜井的此一發言時，還曾如此加以註解。他認為「近代的超克」的問題「在說明若不對戰爭作再解釋、再評價，就無法繼續向前發展，在此點上龜井的發言是相當重要的」。龜井認為在「近代的超克」理念中，有著日本民族再生的祈願。剛才所說的戰爭也同樣背負著這個理念。如果「近代的超克」仍為戰後10年時日本人之課題的話，也就說明了戰爭在思想上仍未得到善後。追究龜井文章總結至此的竹內，從中承繼了「戰爭再解釋、再評價」的問題。而竹內引用龜井於「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上對忽視中國問題的反省，也就是引用「現在回頭來看自己也覺得很訝異，那就是從未去正視『中國』有著怎樣的意義」，據此展開了關於戰爭二重性問題的探討：

龜井，排除了一般戰爭的想法，從戰爭中擷取出對中國（及對亞洲）侵略戰爭之側面，認為只需要對此側面、或者該說此部分負起責任。在此點上，我是相當傾向支持龜井的看法。大東亞戰爭在屬於殖民地侵略戰爭的同時，也是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兩個側面從事實上來看是融為一體，但在邏輯上卻是必須要去加以區分的。

雖然竹內將龜井的看法稱為「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性，但這並不是龜井所說的。龜井雖曾提過，明治以來日本屬東洋也屬西洋的這種二重性，長期支配了日本人對中國的蔑視情感，但卻未曾將日華事變（編按：即七七事變）視為侵略戰爭，認為應該要對其負起責任。可以看出這是竹內從龜井身上承繼「戰爭的再解釋、再評價」問題後，所發展出來的。與龜井的關係如何姑且不論，竹內提到了「大東亞戰爭」有其二重性存在。他認為對中國（及亞洲）的「大東亞戰爭」為侵略戰爭，而對英美的戰爭則為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竹內在之後〈關於戰爭責任〉的短文中，曾如此再次確認了此戰爭的二重性：

（我認爲）日本所發動的戰爭之特性，屬侵略戰爭的同時，亦爲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我的假設當中，此二重性乃來自日本近代史的特質。（〈近代的超克〉，收錄於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七卷《近代化與傳統》）因此，雖然在侵略戰爭的此一側面日本人是負責任的，但在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此一側面，並非只有日本人一方需要負責，這就是我想表達的。

竹內明確地說明關於「大東亞戰爭」之二重性特性認定乃是自己的假設。

但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與對帝國主義戰爭，這樣的「大東亞戰爭」二重性認定，真的能作爲此戰爭的特性認定嗎？

三、戰爭的二重性：二

日本所發動的戰爭，「屬侵略戰爭的同時，亦爲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此具有二重特性的看法在責任論的文脈中或許能夠成立。主要以英美爲敵的戰爭乃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也就是說「彼此彼此」的戰爭，而非像東京審判般假「文明」之名來制裁敗者的行爲。但是對中國的戰爭乃是侵略戰爭，日本很明顯地有責任。像這樣，如果在責任論的文脈下，或許戰爭的二重性能夠說得通。但不可否認這是非常極端概略的論述。

帝國主義國家間戰爭（兩次世界大戰）乃是帝國主義霸權國家之間的對立，屬於爲了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及其重整的鬥爭，無法從中切除侵略戰爭的特性。日本對菲律賓的攻擊，對美國、菲律賓而言是侵略，對新加坡的攻略，對英國、新加坡而言無疑也是種侵略。若要說這些戰爭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所不同，即使再次確認對中國戰爭的責任有多重大，就算改變日本所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之性質，將其二重化看待，也無法改變兩者同屬侵略的此一事實。闡明戰爭的二重性只會導引出，日本對帝國主義的戰爭開通了亞洲殖民地諸國通往獨立的道路，這樣如狡辯般的靖國神社史觀，不是嗎？但細讀竹內的再論，會發現他並非單單只是要闡明「大東亞戰爭」中戰爭性質的二重

性，而是要將此二重性擴及明治以來，包含日本戰爭史在內的對外關係史。就讓我們來看看，將此戰爭的二重性延伸至日本近代史的竹內的此一論述是如何展開的吧：

大東亞戰爭確實有著二重構造，此二重構造是從征韓論開始的近代日本戰爭傳統而來。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是一方面爭取東亞領導權，另一方面則藉由驅逐歐美以達成稱霸世界目標，兩者之間有著補完及相互矛盾關係。原因為何呢？東亞領導權的理論根據便是來自於先進國對落後國的歐洲原理，而亞洲殖民地解放運動便是與此進行原理性的對抗，並不是單對日本的帝國主義作特例處理。另一方面，爲了讓歐美承認「亞洲的盟主」，就必須得要依循亞洲原理，但日本自身則早已在對亞洲政策上放棄了亞洲原理，所以事實上並沒有連帶的基礎。而一方面主張亞洲、一方面主張歐洲的兩手策略之矛盾，將使得緊張不斷產生，因此只能透過無限地擴大戰爭將解決不斷向後延宕，如此才能暫時避開此一矛盾。太平洋戰爭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傳統賦予了成爲「永久戰爭」的宿命。這就是「國體的榮華」。

竹內所稱「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構造，乃是從征韓論開始的近代日本對外關係史所擁有的二重構造，並言太平洋戰爭被傳統賦予了成爲「永久戰爭」的宿命，更認爲那才是「國體的榮華」，將其與「教育敕語」中的文字相連結。擴大到明治以來日本戰爭傳統的二重性究竟爲何呢？還有「永久戰爭」這樣不祥的詞語爲何會出現在此呢？

四、日本近代史的二重原理

竹內將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與對英美的帝國主義戰爭，視爲「大東亞戰爭」所擁有的二重性。他將前者視爲「爭取東亞領導權」的戰爭，將後者視爲「驅逐歐美以達成稱霸世界目標」的戰爭，重新加以詮釋，更將兩者解讀、擴大成貫穿近代日本對外關係史之二重性。竹內認爲兩者雖說是相互補完，但在原理上卻又有著相互矛盾的關係。

1 編按：「教育敕語」是日本明治天皇所頒布的教育文件，「國體的榮華」爲其中用語。

爭取日本在東亞的領導權，乃源自亞洲唯一躋身先進國行列的日本其歐洲原理所要達成的目標。而日本藉著驅逐歐美以稱霸世界，則是以亞洲為背景，成為其盟主並立足於亞洲原理之上。更甚者，竹內稱此為來自征韓論，近代日本戰爭傳統中的二重原理。但日本此矛盾二重原理的兩手策略，也就是「一方面主張亞洲、一方面主張歐洲的兩手策略之矛盾，將使得緊張不斷產生，因此只能透過無限地擴大戰爭將解決不斷向後延宕，如此才能暫時避開此一矛盾」，竹內由此來說明太平洋戰爭的「永久戰爭」特性。

我在此一邊解說竹內先前的發言，最後卻又不得不再次直接引用竹內所說的話，這是因為竹內的理論及話語無法以其他方式加以改說的緣故。不論如何，竹內試著從戰爭中所看出的二重性，將其解讀、擴大為貫穿自征韓論以來的近代日本戰爭史、對外關係史，卻又相互矛盾的二重性。龜井認為，欲在東洋以西洋的日本之身分取得獨立，此一構想導致了日本「近代化的悲劇」，而在《現代史的課題》中寫下對中國侵略反省性之記述。由竹內所提倡將此二重性擴大至日本近代史的此一舉動，可以說是將龜井於《現代史的課題》中的鋪陳加以重整為竹內式的概念。將竹內「近代的超克」再論之論旨導引至戰爭的二重特性，確實是《現代史的課題》中龜井的發言。但戰後，龜井關於中國問題的反省性觀點卻是啟發自竹內《現代中國論》（河出文庫，1951），由這點來看，竹內其自身的戰爭二重性論在受龜井之論說影響的同時，也是憑自力將其重整成日本近代史之二重理論。我在此不斷地提到龜井又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大堆，是想重新確認竹內重新檢討戰時「近代的超克」論的再論，是透過「大東亞戰爭」的再評價問題，而逐漸發展出自己戰後的「近代的超克」論。再進一步追溯竹內所提出的戰爭二重性論（日本近代史的二重性理論）前，就讓我們先來看看由龜井所寫的〈日本近代化的悲劇〉，此一反省性記敘的結尾吧：

從日華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是日本近代化的悲劇，如果簡單來說的話，或許可以這麼說吧。日本，表現出在東洋的「西洋繼子」這樣鮮明姿態的同時，也同樣有著在東洋的「東洋繼子」之形象。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很明顯地成為世界孤兒。在那時候的孤獨感，以及由其中所衍生的不安

與焦慮下，一方面開始帶有憂鬱的內攻性（國內問題），另一方面卻又慢慢向極限熱情（自爆精神）的虛構靠攏。

龜井視太平洋戰爭為背負東洋與西洋之間矛盾，近代日本的悲劇性宿命結局。這與視太平洋戰爭為被日本戰爭傳統賦予了永無終結宿命的竹內的說法，有所不同。因為龜井已經將太平洋戰爭視為日本近代化的悲劇性結局。如此一來，將太平洋戰爭視為被傳統賦予「永久戰爭」的竹內，即是視此二重性為延續至1959年日本現在（編按：指當時）的問題。這點由竹內戰時「近代的超克」論之再論，即為他本身所作戰後「近代的超克」的構成來看，也就益發地清楚了吧。

五、亞洲原理存在嗎？

竹內將對中國侵略戰爭與對帝國主義戰爭——這「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性——重新加以詮釋，成為「爭取東亞領導權」及「對歐美達成稱霸世界之目標」這樣相互矛盾之國家戰略目標的二重性。不僅如此，竹內指出，這些國家戰略的基底存在著歐洲原理及亞洲原理這樣相互矛盾的二重原理。就這樣，戰爭的二重性被擴及日本近代史，被解讀成近代日本的戰爭史、對外關係史的二重性。但「大東亞戰爭」是否真的具有二重特性呢？我已有所懷疑。將「大東亞戰爭」分成兩種戰爭，我認為不過是將日本所發動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特性，狡辯地、曖昧地帶過而已。這場戰爭的二重性即使在竹內將其擴大成近代日本國家戰略目標之二重性，又或相互矛盾基礎原理的二重性之際，我對於此二重性的懷疑也只有更強，而未曾有所動搖。

竹內所說「爭取東亞領導權」與「對歐美達成稱霸世界之目標」這樣的近代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成為歷史上的一個戰略目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但就像我先前所註記的一樣，竹內所謂「對歐美達成稱霸世界之目標」這樣的用詞，讓人覺得過了頭。竹內想用「稱霸世界」來表示什麼呢？我將該詞語解釋成「追求世界秩序的重整」，並用此來解讀。但是，日本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國際政治遊戲主要玩家中的一員，就此點而言，1920年可說是日本近代史

的一大轉捩點。因為此時，日本以強國之姿在世界史的歷程中登場。竹內所謂「爭取東亞領導權」與「對歐美達成稱霸世界之目標」等，成爲一種國家戰略目標而浮上檯面，正是從此時開始。亦即是說，**作爲亞洲盟主的日本從亞洲轉向歐洲發展**，便是從1920年以後開始的。這點伴隨著在大陸上的軍事行動，帝國日本的目標逐漸顯露於世，指的便是從九一八事變起的「亞洲—太平洋戰爭」，這個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過程。在此過程中，雖然包含日本軍部在內的權力內部有著亞洲派與歐美派間的拉扯與爭執，但那並不是原理上的爭執。所以對於可謂帝國日本存立絕對前提之大陸政策，這樣的國家戰略絲毫沒有半點加以改動的意向。昭和日本在逐漸轉向歐美的同時，也賦予了大陸政策軍事性的型態。向先進的歐洲文明國家學習，朝先進國躋身之路前進的日本，現在已達到與先進文明諸國及帝國主義霸權相競爭之階段。那便是昭和年代。此昭和 Japan 所立足的原理不是亞洲原理，而是歐洲原理。竹內也曾引用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如此說明：

福澤身爲激進型啓蒙者的角色，大概到中日甲午戰爭時就完結了吧。他的思想已成爲國家思想被實現、確立下來，故而思想家的身分也就自然消滅了。之後所有的軍事行動及外交政策，盡悉皆由其文明一元觀加以正統化，至少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半段是如此。

竹內在這裡所提「文明一元觀」指的是，將日本的近代化導向一元的歐洲文明化之方向，即福澤的文明論立場。竹內認爲那代表著由歐洲原理所指導的近代化，也是近代國家日本的原理。但竹內把期限定於「至少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半段」，或許與他所提戰爭的二重性有所關連吧。總而言之，竹內也認爲歐洲原理乃是近代日本國家的正統原理。那麼亞洲原理在什麼地方呢？亞洲原理真的是日本國家戰略基礎上與歐洲原理相互矛盾糾纏的存在嗎？

對於亞洲原理，竹內也說，乃是日本對歐美以亞洲爲背景主張自我時，所必要的對抗原理。但這主張自我的日本卻是立足在歐洲原理上的先進國家，因此日本僞裝出的亞洲原理一下子就露出破綻來了。「爲了讓歐美承認『亞洲的盟主』，就必須得要依循亞洲原理，但日本自身則早已在對亞洲政策上放棄了亞洲原理，所以事實上並沒有連

帶的基礎。」竹內也曾如此說過。歐洲原理是近代日本國家形成的基礎，並作為明顯的文明實體而存在著。但亞洲原理的存在方式，並不是像歐洲原理在日本的國家形成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亞洲原理是為了解決對抗或抵抗歐洲原理所必須存在之非實體、負的原理。就像相對於歐洲的亞洲此一概念本身即是如此。竹內說「透過否定文明的文明再建。這就是亞洲原理，把握了這個原理的即是亞洲」。亦即是說，竹內認為對以文明一元論支配世界、滲透世界的歐洲文明，透過否定加以對抗，以此否定來再建文明的原理即是亞洲原理，掌握此原理的就是亞洲。這就是竹內所說的亞洲概念中優異的非實體構成。像這樣的亞洲原理，才是日本近代史少數非正統者所肩負的抵抗原理。如此一來，所謂的亞洲原理，就無法成為在近代日本國家戰略的基礎上，與歐洲原理相互矛盾、形成二重性而存在著的原理。但是竹內在「近代的超克」再論中提到，由於「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性，近代日本國家戰爭傳統中矛盾的兩原理持續著緊張狀態，而這就是賦予太平洋戰爭「永久戰爭」宿命的的原因。這到底是指什麼呢？是竹內自相矛盾地將亞洲原理實體化成了在歷史上的對抗原理了嗎？但是敢於作如此發言的竹內，究竟想表達的是什麼呢？是「永久戰爭」嗎？

六、所謂的「永久戰爭」

竹內在「近代的超克」再論中，認為「太平洋戰爭的思想性特質，目前仍尚未究明」，所以用近代日本三大戰爭（中日甲午、日俄、大東亞戰爭）的開戰詔敕作為線索，試著擷取出戰爭「公的特質」。從「大東亞戰爭」開戰詔敕中，竹內引用如下：

天佑永享萬世一系皇祚大日本帝國天皇，向爾等忠誠勇武之眾宣示。／朕在此對美國及英國宣戰。朕希望陸海將兵舉全力參戰，朕希望百僚有司勵精公務，朕希望眾庶各司其職、億兆一心、舉國家總力以達征戰之目的。／（中略）事已至此。帝國現在為求自存自衛，除蹶然而起破除一切障礙外別無他法。／皇祖皇宗神靈在上。朕信倚爾等之忠誠勇武，期待爾等能恢復祖宗偉業、剷除禍根確保東亞永久和平，以保全帝國榮光。

竹內引用以上宣戰詔敕，由此導引出戰爭的思想性特質。他除了指出「總力戰」等特性外，並以「透過整體文脈，可以感受到永久戰爭的理念。戰爭的終極目標為『確保東亞永久和平』而非一般的和平。從此文脈也可以讀出其中蘊含著稱霸世界的構想。」作為結論。竹內並不是從詔敕中特定的某處，而是從整體文脈中感受到了「永久戰爭」的理念。但竹內對於詔敕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一詞，認為此「和平」乃是戰爭的「終極目標」而非一般的和平，且詔敕的文脈隱藏著「征服世界」的構想。戰爭的「終極目標」或「稱霸世界」等用語指的是，超越了以談和條約來終戰這樣實際的相對戰爭（和平）概念，以及如此的絕對戰爭（和平）概念。或許竹內想說，正因為以「東亞永久和平」為目標的戰爭，所以才能成為理念性的永久戰爭吧。竹內在「近代的超克」再論中，對高坂正顯等四名京都學派學者所舉行的「世界史的立場」等一系列座談會，有著極高的評價。特別是第三回座談會「總力戰的哲學」，竹內譽其為關於宣戰詔敕從未有過「如此完美的說明」。我在此所引用竹內關於詔敕的解釋，基本上也是延伸自「總力戰的哲學」。竹內引用高坂等人對於「總力戰」的發言。亦即是引用以下發言，如「總力戰」指的是「所有事物都將改變的表現」（鈴木正高）、是永久戰爭、是改變戰爭概念的戰爭、是導引向「揚棄戰爭與和平這樣相互對立的事物，也就是創造的、建設的戰爭這樣嶄新理念」（高坂正顯）的戰爭。在此，竹內藉由京都學派關於「總力戰」的哲學性解釋，重新整理「永久戰爭」概念。在此重整之際，竹內從此座談會中得到了更重要的東西。竹內本身雖然沒有引用，但對於竹內的「大東亞戰爭」再評價有著相當重大意義，故在此由座談會紀錄中引述：

這次的戰爭簡單地說就是秩序的轉換戰，是世界觀的轉換戰。而只要世界觀是屬於思想的事物，這次的總力戰也理所當然在其根底有著「思想戰」的特性。……而，要說這次的戰爭何時才能結束的話，要等到我們所提倡的新秩序思想得到敵人的理解與贊同為止，才能迎來最後的結果。此時乃是英美敗亡之時。當然有時透過武力來迫使對方接受也是必要的，但最終還是要讓敵人在思想上贊同。……總而言之，在對內對外方面讓思想煥然一新，才是這次戰爭真正的意義所在。（高山岩男）

唯有將「大東亞戰爭」視為思想戰，戰爭才能擔負起「永久戰爭」的理念。竹內除「永久戰爭」的理念外，戰爭的思想戰此一特性的認定，也同樣是受到京都學派座談會的啟發。對保田與重郎來說，戰爭乃是對十九世紀歐洲文明原理的文明戰爭。文明戰爭乃指不隨敗戰而結束的「永久戰爭」。「大東亞戰爭」被認為具有思想戰特性的同時，也就表示該戰爭已背負起永無終止的「永久戰爭」理念。

七、戰後的「近代的超克」論

據竹內所言，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性乃是來自於位居亞洲的日本以亞洲為背景、作為「先進國家日本」出現在世界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近代日本國家的成立本身所引起的二重性。對於屬於近代國家日本存立基底的二重性，加入對中國侵略戰爭與對英美帝國主義戰爭，此二重戰爭解釋的乃是昭和日本。而宣戰詔敕又賦予了擁有此二重性戰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這樣「永久戰爭」的理念。且昭和知識分子在開戰的戰慄中，也將戰爭所背負的思想課題視為是「近代的超克」。這件事也意味著他們將屬近代日本存立基底的二重性問題，當作是「近代的超克」這樣的思想課題來討論，也說明其下定決心參與「近代的超克」此一思想戰爭的意思。此思想戰爭當然也必須得是「永久戰爭」這樣永無終止的戰役不可。竹內曾如此說過：

「近代的超克」，也就是所謂日本近代史難題(*aporia*)的濃縮。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等傳統基本軸上的對抗關係，在總力戰的階段中，在面對不得不去對永久戰爭理念作解釋時，一口氣爆發出來的，就是「近代的超克」這個議題。

「近代的超克」這個提問是正確的。但竹內認為此思想戰爭並無實地交戰，此課題便已隨著敗戰而煙消雲散。隨著敗戰而消失的除了「近代的超克」此一課題外，還有日本近代史的二重性難題。竹內認為戰爭在中日戰爭還未結束的情況下，只有太平洋戰爭獲得終結，而在此終結上開始了日本的殖民地戰後。思想戰爭並未發動。也因此戰後日本人並無思想上的敗北感：

而沒有敗北感這點才是今日的問題。也就是由敗戰所導致難題的消失，使得思想被凍結在荒廢狀態。這種情況之下，思想不可能發揮其創造作用。如果想要試著恢復思想的創造性的話，就必須解除此凍結狀態，再一次將此難題列為課題重新面對。

1959年，日本自主性地進入美國的核子傘下，《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問題成爲全民關注議題時，竹內認爲日本人應該要重新面對自我存立基底上的二重性難題。並且，在面對此難題的戰鬥中，或許能讓我們再次去確認己身中那作爲抵抗原理存在的亞洲原理。如此，身爲戰後「近代的超克」戰爭主體的日本人，才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戰後獨立的日本來。